

编者语：本次栏目有两篇文章，作者都是历史学界的青年才俊，分别来自云南、北京两地。碑刻文献是见证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史料，当前学界有关古代碑刻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薛昊博士根据清代碑刻来研究滇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交融，可以说该选题有着比较独到的视角和创新性洞见。李子君博士的文章是关于清代四川杂谷土司的研究，作者对相关历史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较为深入地研究，对推进清代土司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碑刻所见滇南社会文化变迁与交融

薛昊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清代在今景东、镇沅、景谷、思茅等滇南腹地的治理活动对该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变迁。文教的兴办、移民的涌入，推动了汉文化在滇南不断延伸，并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度交融。传统史料对滇南社会的记述多以政区为单位展开，对基层社会的描述较为笼统，而同时期遍布滇南的各类碑刻则为探讨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新颖的认知视角。各类碑刻细致呈现了改流后内地文化在地域空间的恢拓，以及各族文化的多元交融等社会变迁历程。

关键词：清代碑刻；滇南；改土归流；社会文化；变迁交融

中图分类号：K249.2；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0)04-0023-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0.04.005

The Social Cultural Changes and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A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XUE Hao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hinterland of southern Yunnan, including counties of Jingdong, Zhenyuan, Jinggu, Simao, etc.,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inland immigrants have promoted the extension of the Han culture in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and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it ha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ur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describe the southern Yunnan society mostly in the political are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is more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inscriptions throughout southern Yunnan provide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reg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Various inscriptions meticulously present the expansion of the inland culture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divers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Key words: inscrip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Bureaucratization of Local Chieftains; social culture; changes and integration

清朝对滇南的经略始于顺治年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平灭附明之元江土司那嵩后，元江遂改流^{[1]378}。此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重心逐渐转向景东、镇沅、

收稿日期：2020-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7—19世纪的勐泐及其与明清王朝、缅甸和暹罗的关系研究”（16XZS022）。

作者简介：薛昊（1992—），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

威远、思茅等滇南腹地，康熙年间在保留景东陶氏土知府的同时又设流官同知掌握实权，以达到控扼景东的目的。而雍正朝以后改流步伐进一步加快，雍正二年（1724年）土知州刀光焕获罪革职后威远州遂改流^{[2]365}，雍正五年（1727年）又以镇沅土知府刀瀚扰乱地方为予以革职，镇沅亦随之改流^{[1]645}，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府的设立则标志着清代滇南边疆治理活动达到高潮^{[1]20}。

在改土归流之前，已有部分内地移民迁至滇南腹地，增进了该区域与云南内地的交流^{[2]327}。而改流后的滇南社会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内地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促使原有区域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而这一时期滇南地区的各类碑刻则成为认识上述社会巨变的重要窗口。清代碑刻广泛分布于前述景东、镇沅、威远、思茅、他郎等滇南各地，囊括学宫碑记、名人墓志等，从基层社会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兴办文教、建庙祈福、人物事迹等诸多史实，细致呈现了清代滇南社会的面貌，揭示了改土归流后滇南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与脉络。

一、文教的兴办与内地汉文化的延伸

改土归流后的滇南社会，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内地汉文化在地域空间上的恢拓。尽管在改流前部分汉族移民亦曾带来些许内地文化，但滇南与内地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则是在改土归流之后。改土归流后，伴随着中央王朝行政体系的拓展和内地移民潮的到来，内地文化得以在滇南腹地不断延伸。流官府县的设立打破了此前土司独大的区域政治格局，中央王朝的权威愈发凸显，文教系统得以逐步建立。内地移民的迁入和文庙学宫的普遍兴办则又进一步推动内地文化向滇南基层社会延伸，从一定程度上促使该区域社会文化风貌发生了显著变迁。据黄桂枢主编的《思茅地区文物志》的统计来看，清代滇南地区的碑刻数量远超此前历代，各类学宫碑记等则成为标志着内地文化不断恢拓的历史印记。

内地文教在滇南各地的延伸脉络存在时空差异。从时间维度来看，位于滇南外缘的景东等地最早受到内地文教的熏陶，而位于滇南腹地的镇

沅、威远、他郎、思茅等地则于较晚时候方才普遍建立文教体系。从地域维度来看，景东相比于前述各地而言，其所受到内地文化的影响亦更为持久和深远。各类学宫碑记对此有明确记载。现存景东文庙的《迁移黉宫碑记》曾述景东文教之久远。

“有明设卫学于玉屏山下……我朝顺治十七年，改徐指挥宅为府学……景郡沐浴仁宇者百有余年，其间师儒之揖让，涵咏华风。”^{[3]94}

由此足见景东兴学历史之久远，受内地文化风俗浸染之深厚，相比之下今墨江、宁洱等地文教之兴办则较晚。清代称为他郎的今墨江地区直到道光元年才建立文庙，道光三年所立之《他郎新建文庙序》曾对他郎文教的滞后有详细陈述：

“盖他郎昔属元江，康熙间已有补弟子员者，特尚未设专官……乾隆癸巳改隶普洱……仍因陋就简，春秋释奠，典废弗举。”^{[3]96}

而普洱府城所在之宁洱地区文教之发展亦相对滞后，规模较大的普洱府宏远书院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才建立。但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央王朝边疆治理的深入，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使得有清一代内地汉文化在滇南腹地广泛传播。

清代曾大兴滇南文教，雍正七年时任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即奏称：

“新设之普洱府，应建立学校。请于元江府学调补训导一员，董率启迪。入学额数，照滇省小学例，取进八名。其从前附入元江府各生，俱划拨普洱府学。”^{[1]20}

景东等处亦广设学宫。文庙学宫的建立是内地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标志，前述《思茅地区文物志》^[3]曾予以详细统计，各类学宫碑记详细呈现了清代滇南兴办文教的社会历史图景。就年代而言，前述碑刻上自乾隆下至光绪，前后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呈现了清代滇南文教事业发展历久弥新。而从空间上来看，各类学宫碑记广泛分布于今景东、镇沅、墨江、思茅、宁洱等各地，反映了清代内地文化在地域空间的不断拓展。兴文教之目的在于易风俗以佐治世，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景东福都义学碑记》即言：

“尝闻称致治者，莫要于厚风俗，而欲厚

风俗者，莫急于广教化，教化兴则礼义明，礼义明则争竞平，而风俗厚焉，□^①而继之以教者，虽圣治无以易也。”^{[3]136}

文教事业推动了地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内地尚文教，明礼义的风俗得以在滇南腹地不断延伸，收效显著。前述碑文即载：

“景郡地属边隅，……且隶籍土府人未知学，故其风乔野，沿至雍正十三年，仰沐皇仁覃敷文教，遍泽化雨，建设义学，俾家诵户弦□□经纶育下颀。……乾隆三年，元腾辞馆，复延邓士哲为师，风化渐开”^{[3]136}

作为滇南门户的景东，早在明代设立卫所时即有大兴文教之风，及至清代则文教愈发昌明。就碑文来看，景东地方士绅踊跃支持兴办义学，且自改土归流后兴学之风日久，历经数代绵延不绝，其社会风貌产生了显著变迁。而发展较晚之墨江地区亦因文教之兴而收移风易俗之效，道光三年（1823年）《他郎新建文庙碑记》载：

“凡他郎三里有半，款读朴耕读之民，莫不踊跃感动输将子来，不敢自外于圣人，则彝良之好可觀矣。”^{[3]96-97}

在文教事业的推动下，内地知书明理、耕读传家之风日盛，清道光《普洱府志》风俗条即载：

“国初改土设流，……户习诗书，士敦礼让，日蒸月化……具有华风。”^{[4]89}

而内地文化在滇南腹地延伸恢拓的同时，亦与该区域内多元的各族文化相互晕染，呈现出各族文化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

二、滇南各族文化的多元交融

滇南自古即为边疆多民族地区，今景东、元江、镇沅、景谷、思茅等地在历史上多为傣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先民的主要分布区。改土归流与内地移民潮到来之前，在傣族土司占据主导的区域社会中，坝区傣族与山区各族之间建立了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而随着改流与移民潮的到来，各族杂居共处的趋势愈发显著，使得内地汉族文化在滇南广袤腹地延伸恢拓的同时，亦

与该区域社会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的交流、交融。

（一）民族文化的多元

各族文化的多元纷呈是清代滇南区域社会文化格局的重要特征，在文教事业推动内地文化不断拓展的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亦多有呈现，滇南各地多有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即是历史印证。

历史上滇南曾是彝族的重要分布区，道光《普洱府志》即曾对此有所记载^{[4]193}，故而清代滇南地区留存有一定的彝族文化印记。例如现存的江城小么等彝文墓碑记述了彝族墓主普之照的生平，碑文大意为，“墓主普之照，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清道光六年”，立碑者则为两位女儿“普世云、普世贤”^{[3]145-146}，碑文呈现出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而位于普家村的彝文墓碑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滇南彝族的迁徙历史。据专家调查考证得知，该碑立于清道光年间，反映了清代该地区彝族家族近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3]146}

除彝族外，今滇南地区亦是傣族先民的重要分布地区。傣文佛寺碑记即是清代滇南地区傣族文化留存的印记，并呈现出浓郁的南传佛教文化特色，位于今景谷的芒宏佛寺碑记即详述了当地傣族群众建造佛寺的历史传说。碑文载：

“傣历 1217 年（公元 1855 年），一天早上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大山寨人英皮亚和芒朵人英达版那两人……看见在今芒宏朝仙的这个地方的草地上，有一和尚正在那里拜佛，……两位傣族中年人都认为他俩同时见到的和尚一定是帕召（傣语即佛祖释迦牟尼）来显灵了……后来由大寨土司发伦发起，附近傣族群众献工献料，捐钱捐米，建盖了芒宏巴达。”^{[3]152}

由碑文可知，清代滇南地区傣族的南传佛教文化浓郁，直到咸丰年间崇佛之风仍然十分盛行。前述清各代滇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印记的广泛留存表明，在内地文教向滇南腹地传播的过程中，各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

①“□”代指此文缺一字，下同。

（二）各族文化的交融

各族文化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呈现出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少数民族上层对内地忠孝文化秩序的接纳以及基层民众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是清代滇南地区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的显著特征。

作为清代滇南主要少数民族的傣族与流官、移民的交流非常频繁，其与内地之间的文化涵化与交融亦最为显著。清代滇南傣族土司与官府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承袭、朝贡、助剿等事务多是在流官的领导之下进行，故而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傣族土司亦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在文化观与国家观上呈现出一定的转变。《泐史》对于清代车里傣族土司承袭流程曾有记载，其中关于清末光绪年间宣慰使刀钧安的承袭历程颇为详细：

“小历 1237 年乙亥（清光绪元年，公元 1875 年）六月晦，叭班雅那贡等，随刀钧安至思茅办理承袭宣慰使手续，领取印信、布告、札子委牌等……六顺土把总诏孟称：……同时十二版纳贵族、各猛土员，亦向思茅汉官，领取关防文书。须取具宣慰使印结保结二份，呈送思茅汉官，又二份呈送云南总督……其印结文曰：‘世袭车里宣慰使刀钧安，具印结于思茅厅文武长官台下：刀某，实系宣慰嫡系，所有人民均一致决议，出具保结，恳求汉官大人，颁发关防照纸，俯准袭职。请转报各层峰及天子钧鉴’。”^{[5]160}

由《泐史》所载来看，车里宣慰司及其下属各土目直到清末仍与内地流官保持密切的隶属关系，呈报与批复的承袭仪式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其政治认同的强化与忠节文化观的形成。而清代官方史籍对于地方尽节土司的褒奖亦无形中强化了傣族土司忠孝节烈的文化观念。据统计，清道光《普洱府志》人物条所载之地方忠义人士中就有刀国珍、刀腊、刀克里、刀世爵、刀勃勃、哄占、刀文祥等数十位为清廷效忠尽节的各级土目，其分布遍及滇南之威远、思茅、车里等各地。^{[4]170-174}在这种双向交互的文化塑造过程中，滇南傣族土司的忠节观念得以不断强化，呈现出与内地汉文化的涵化与交融，而广布滇南的碑刻即留存了前述文化观的历史印记。例如景谷练目刀忠谨曾协助清军攻打起义

军而阵亡，其墓志碑文中即体现了浓郁的忠孝节烈文化观念。碑文载：

“忠孝二字人生大节所关，而能尽者实难。……猛戛圈东刀族屡以忠显也。……刀三兄台，效力迤东，捐躯赴义，大显其忠。”^{[3]74-75}

类似碑记在清代的滇南并不是少数，位于思茅的六顺都尉刀心亭墓志即为又一例证，亦体现了浓郁的明理识体，尽忠职守等礼义观念。碑文载：

“刀公讳林锡字心亭，六顺白马山世袭印官也，……齐读圣贤书，汲汲孜孜勤求不懈，……试屡列前茅，未及院试而改官，详求治理。”^{[3]75-76}

前述碑文中的汉族姓氏字号，以及浓郁的儒家治世观念充分反映了清代滇南少数民族上层文化观念深受内地文化影响而呈现文化交融的史实。与此同时，各族民众之间亦有颇多的文化交融。清代内地移民大量涌入滇南，并与各少数民族杂居，在市易、耕读等生产、生活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的文化亦多有交流、涵化。各族共处杂居的格局为各族间的交流、交融奠定了前提，清代滇南各族杂居的情况已十分普遍，清道光《普洱府志》曾载普洱府城民族杂居之情形，文化交融之现象十分普遍。

“民皆夔夷，性朴风淳，蛮民杂居，以茶为市……夷汉杂居，男女多交易。士乐业，盐茶通商。”^{[4]89}

各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威远厅亦然。

“民皆汉夷杂居……夷人渐摩，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教。”^{[4]89}

杂居与市易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基础，清代繁荣的普洱茶贸易亦成为滇南各族重要的交流渠道，期间的文化交融亦十分显著。有学者指出，来自石屏等云南内地的汉族移民将内地先进农业技艺传入滇南茶山的同时，亦促成了茶山等地社会文化的变迁，神祇祠堂、会馆学宫的广布，以及茶山年节风俗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普洱茶贸易对于各族文化交融的推动作用。^[6]而遍布滇南各地的碑刻即是留存此图景的历史印记。宗教活动亦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场域，清乾隆五十年所立的景谷大仙人脚佛寺傣汉双语碑记即展现了各族共同参与南传佛寺建设的史实。该碑从形制上即体现出傣汉文化融合的特征，

“（石碑）阳刻大‘佛’字。碑阴刻有用傣文横书之碑文……碑上有汉文题联。”^{[3]139}傣汉双语的碑刻形制表明，在佛寺的创建过程中亦有内地汉族民众的参与，各族民众在建设南传佛寺的过程中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碑文亦证实了这一点，并为各族人士祈福。

“傣历 1136 年（公元 1774 年）属蛇年，……凡前来参加建筑大殿的，不论大人或小孩，也不分民族，祝愿人人都能超度升天。”^{[3]139-140}

而类似的碑刻在滇南并不鲜见，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澜沧芒景傣汉双语功德碑亦呈现出民族文化交融的形制特点。“碑额阴刻横书汉文‘功德碑记’……其下为阴刻傣文……下侧刻‘春茶’两个汉字，记述布朗族建立芒景佛寺的经过。”^{[3]155}前述碑刻所体现的各族文化交融是清代滇南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而文化交融的背后更反映了清代滇南地区各族民众之间交流、交融密切而频繁的史实。

清代滇南碑刻是认识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与交融的重要资料。内地汉文化在改土归流后，伴随着

文教体系的建立与移民潮在滇南腹地广泛传播，并在各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社会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的涵化、交融。上述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印记在广布于滇南的各类碑刻中得以留存，这些富有历史感的碑刻，成为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呈现了清代滇南地区各族之间交流密切，文化交融的社会历史图景。

[参考文献]

- [1]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三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 [2] 江应樑. 傣族史 [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3] 黄桂枢. 思茅地区文物志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4] 中国地方志荟萃编委会. 中国地方志荟萃·西南卷：第六辑（壹）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 [5] 李拂一. 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溯史 [M]. 重订本. 台北：复仁书屋，1986.
- [6] 张力尹. 清代古六大茶山汉族移民与茶山文化的再造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7-92.

（上接第 16 页）

[参考文献]

- [1] 安徒生. 我的童话人生 [M]. 傅光明，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 [2] 荷马. 奥德赛 [M]. 王焕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3] 王以欣. 塞壬的起源、形象与功能 [J]. 古代文明，2019，13（2）：10-19，125.
- [4] 安徒生. 安徒生自传 [M]. 林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5] 安徒生. 安徒生童话全集：卷 1 [M]. 叶君健，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6]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卷 1 [M]. 朱生豪，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 [7] 路新杰. 德国人鱼文化意象的嬗变 [J]. 世界文化，2017（8）：61-64.
- [8] 白慕申. 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从童话到民族的象征 [M]. 甄建国，周永铭，胡洪波，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9] ANDERSEN H C. H. C. Andersens Samlede Skrifter, Ottende Bind [EB/OL]. [2012-10-01]. https://www.hcandersen-homepage.dk/?page_id=29981.
- [10] 伊莱亚斯·布雷斯多夫. 从丑小鸭到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生平及著作 [M]. 周良仁，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序.
- [11] 蔡胜德. 以《国王的新衣》和《人鱼公主》为例 [G] // 张书豹. 2002 安徒生童话之艺术表现及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文化建设委员会，2002.
- [12] 海涅. 海涅文集：诗歌卷 [M]. 张玉书，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13] 丁乃通.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M]. 郑建成，李惊，等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